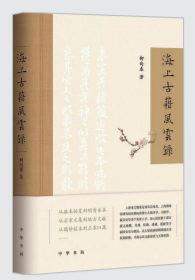


新书掠影

作者从版本学、文献学、藏书史等多个角度入手,深入探究数十部古籍之编撰、刊刻、校勘、递藏、题跋等方面的史实与源流,以大量高清图册展现古籍版刻原貌,揭示其文献价值与文物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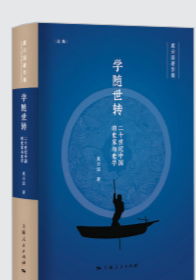


《海上古籍风云录》 柳向春 著 中华书局 2023年6月出版



自16世纪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涌入西伯利亚这片充满未知的“极北之地”。作者曾多次前往西伯利亚,这本书让读者真切地看到“极北之地”如何从无人问津到举重若轻。

《极北之地:西伯利亚史诗》 [美]埃里克·厄斯利 著 夏显华 徐梓钰 译 译林出版社 2023年5月出版



本书以吕思勉、陈垣、陈寅恪等史学家为典型个案,再现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与学术生涯及其历史观与方法论,既勾勒出中国百年史学的辉煌业绩与曲折走向,也真实还原了史学大家的命运遭际与心路历程。

《学随世转:二十世纪的史家与史学》 虞云国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6月出版



本书对 ChatGPT、GPT 和 AI 的发展进行了全面分析,帮助读者了解三者的不同,厘清 ChatGPT 的实质,看到 GPT 的技术突破,展望 AI 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ChatGPT:读懂AI爆发背后的技术与产业逻辑》 项立刚 刘欣 项天舒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3年6月出版



国难之下,国宝颠沛流离,保全文物,就是保全民族的文化之根。本书选取了故宫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也最为可歌可泣的一段历程,还原历史原貌,塑造了鲜活的文学形象。

《故宫文物南迁》 祝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3年5月出版

书人茶话

从饱腹到情怀:“吃”的进化史

王 文

哪怕是能自制烤炉并用其烤出几可比拟面包房出品的王世襄,哪怕是能将百姓餐桌上最寻常的荠菜或者豆腐干琢磨成人间至味的汪曾祺,在很多人看来,他们关于食物的文字在他们的等身著作中也只能说是正餐之余的点心。但当唐鲁孙的作品风行一时,而其文集中竟有一半文章是在谈论吃什么和怎么吃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以食物为主角的书写,也是可以成就大家的。于是乎,专写美食的作家层出不穷,与食物相关的书籍更是行销不衰。



《豆子的历史》 [美]肯·阿尔巴拉 著 范凡 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高卢的技艺:法兰西西饮食史》 [法]玛丽安·德本 著 何帅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爱吃我们没烦恼》 陈佳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豆子的历史》,一种食物进化史;《高卢的技艺》,高端法餐的进阶之路;《爱吃的我们没烦恼》,从一单食一瓢饮中获取的个体感受,这是三本除了“吃”字外彼此之间貌似毫无关联的新书,但把这三本书放在一起比对着阅读,关于能在谈论食物的书里读到什么的答案,或许就能浮出水面。

卑微的豆子,逼人创造美食

某公司正在推进一个秘密项目,研发一种不会让人放屁的豆子——以这一有“味道”的科学实验来开篇的《豆子的历史》,也许会让读者产生一个疑问:既然吃了以后有这样的尴尬事,人类何以不放弃食用豆子?

肯·阿尔巴拉,这位被挖了肾的肾脏捐赠者,与豆子耳鬓厮磨了那么多以后,最清楚豆子在人类发展史上起到过什么样的“助攻”作用:“地球上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本土物种,几乎每一种文化都依赖豆子。”肯·阿尔巴拉在《豆子的历史》中的那些豆子,有的早已是我们的老朋友,比如蚕豆、鹰嘴豆、豌豆、大豆;有的则连喜爱食用它们的人也比较陌生,比如在新月沃地被驯化的扁豆、出产在欧洲和安第斯山的羽扇豆、在美国生长的各种菜豆等;至于那些我们闻所未闻的豆子,如荷包豆、棉豆和水豆,更是佐证了肯·阿尔巴拉所说的“这个世界没有一座豆子山”的说法。不是夸张——原

来,那些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或圆润或扁平的豆子,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把世界团结在了一起。

可因此就断言“每一种文化都依赖豆子”,是否能让人信服?肯·阿尔巴拉十多年前开始做以单一食物为主题的历史研究,多年爬梳历史资料发现,豆子之所以能在世界的每一块土地上找到自己的“原生家庭”,是因为蛋白质是人类必需的营养。当肉类供应跟不上人类对蛋白质的需求时,散布在各地的人类祖先开始寻觅替代品,豆子这种肉类之外富含蛋白质的食物,进入了人类视野。渐渐地,有人类生活的地方,就出现了被人类驯化的品种不一的豆子。由此,说豆子供养了世界上的每一种文化,论据确凿。

然而,作为肉类的替代品,豆子也早早地被贴上了穷人食物的标签。富人拒绝食用豆子,除了因为有钱吃得顾不上,他们更害怕食用豆子后带来的不适感。富人的拒绝,让豆子的身份显得那么卑微,也因为卑微,豆子成了穷人的福音:“对于许多人来说,豆类改变了生与死之间的关系。”肯·阿尔巴拉所言极是,如若没有豆子,世界的人口分布图还会是今天的格局吗?难以想象。

既然离不开豆子,就想办法地改善与豆子的关系。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与豆子之间的缠斗从未曾停止过,在不断驯化豆子的同时,人类还在不停地尝试如何将品相到滋味都非常“倔强”的豆子,弄得更加可口易消化一些。被《豆子的历史》收入的不同年代、不同国度的以豆子为主要食材的菜谱,总有上百

例。人类一直在追求美好生活,从吃饱肚子到满足口腹之欲,豆子就是一个代表。

法餐,成为顶级美食的进阶之路

一旦家有余粮,就想想办法将能到手的食材弄得美味一点再美味一点,此条美食之路,全世界通行。所以,玛丽安·德本的《高卢的技艺》是一本可以被世界各地菜系比照的美食成长史,就这本书的实质而言,副题“法兰西西饮食史”更加简单明了。

今天,法餐已是举世公认的顶级美食之一,可又有多少美食爱好者知道,能在世界餐饮界登顶,法餐一路走来始终在披荆斩棘。

玛丽安·德本认为,始于高卢时期的法兰西西饮食,经历过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大革命、19世纪、殖民地年代、摩登时代等几个时期,才有了今天的模样;而法餐之所以能成为世界顶尖美食,与生活在法兰西西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习性和对食材的认识,有着密切关系。将这种关系稍加归类,玛丽安·德本总结出玉成法餐的三股力量,分别是:原料法国故土肥沃土壤的农民、地道的大众饮食和永远的美食主义——这样提纲挈领地概括“高卢的技艺”,是否会让读者觉得,以多情的法语与法国文学为主业,有时也跨界到法国饮食史做研究的法学者,将活色生香的法餐写得大相径庭了。事实上,玛丽安·德本为法餐谱写颂歌时,在保证资料可靠的前提

下,特别喜欢用有趣的凡人小事铺展出一条法餐成为顶级美食的进阶之路。我们择其要者来体会一下: 1125年,有人对一座修道院僧侣的饮食提出了严厉批评,指责修道院的厨师使用了“引诱”味蕾的佐料;两个世纪以后,一本名曰《巴黎管家》的美好生活指南问世,其中详细记载了蜗牛的两种烹调方式:水煮和油煎;到了17世纪,巴黎涌现出大量的烹饪书,如《厨房里的哲学家》《餐桌上的巴黎》《巴黎厨师》《烹饪艺术》《管家》等,虽然关于美食,它们都有各自的解析,但强调烹调绝不不仅是将食物做熟,是它们共同的声音……

看到了吧?哪怕在法餐的诞生地,人们对是否要追寻美食也经历了逐渐达成共识的过程,既出现过像卡莱姆这样引领法国厨界将法餐推向经典高级料理的大人物,也出现过某位贵族家的厨子因为制作的菜肴不被主人接纳而自杀的伤心事……既然如前所述法餐的沿革是世界各国美食成长史的镜像,那么,被玛丽安·德本写进书里的大事小情,连接的就不仅仅是法国的餐餐史,它告诉我们,人类为一口美味所付出的努力,让自己齿颊留香之余,也在大地上留下最有味道的活动痕迹。

一单食一瓢饮,都值得歌颂

假如说,《高卢的技艺》是站在山顶瞻前顾后的多乐章作品,那么,《爱吃的我们没烦恼》则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吃货的美食笔记,是陈佳勇流连于街头巷尾的大街小巷路边摊后诉诸笔端的颂歌。

但总共三辑22篇文章汇编而成的这本书,并非每一篇都在夸赞人间至味,出现在陈佳勇笔下的一单食一瓢饮,有的还真称不上高端,比如,被选入第一辑“吃什么都很重要”的《菜泡饭》。如若记录的是澳洲龙虾泡饭这一高级餐馆的新贵,那又另当别论了,陈佳勇《菜泡饭》的主角是一碗在作者“实在是没有胃口,浑身发冷,被抽空了”的菜泡饭。那么,紧挨着建国饭店大堂吧的一家叫“小上海”的餐馆烧煮的这碗菜泡饭是否暗藏独门绝技?会不会离谱但也不会惊艳,是“小上海”的老客人陈佳勇给出的点评。无非是切得细细的青菜和香菇,下油锅翻炒

后加入高汤,煮沸后放入打散的冷饭团,再开锅后撮一点事先炒过的肉丝扔进去,即成。以这么简单的操作流程完成的菜泡饭,是上海家庭餐桌上的家常菜,但它却让作者联想到小时候妈妈特意为他煮的加了青菜的大杂烩泡饭——“小上海”的那碗菜泡饭之所以能让陈佳勇浑身通透,是因为让他想起了妈妈的味道。

然而,与《菜泡饭》仅隔着一篇《大排面》的《下沙烧卖》中,陈佳勇却又断然否定了这种联想:“单从正常的饮食习惯而言,当你长时间吃一种菜,口味是会改变的。所谓故乡的味道,菜的味道,隔的时间越长、越不接触,味觉是会疏离的。突然一道菜吃出家的味道,主要还是因为你好久没有回家了。但要真的那么久没回家,再回到家吃那一口‘妈妈烧的菜’,其实未必有那么好的效果,多半是自我美化。”琢磨一下陈佳勇的这番剖席佳肴与“妈妈的味道”的言语,不无道理。这就让人警觉起来:那么多新老作家热衷于将烈火烹油的人间美食化作清冷的文字落在报章书箱里,只是为了炫耀曾经满足过自己的那些美食吗?就像陈佳勇,将自己遇到的一餐饭一杯饮极富感情地记录下来,只是为了告诉读者,自己到过之处哪家餐馆的哪道菜哪口汤值得推荐吗?

我想,这本书透露的是陈佳勇乐于为美食画像的心声。他是想通过食物记忆,帮助自己也帮助那些与他在同一片天空下经历过风和雨的读者,记住属于自己的风云际会。而遍布在书里的那个一个个被食物“牵引”出来的饱蘸温情的故事,则让人深感,如果全世界还在以豆子充饥的话,陈佳勇所写的因一碗尖椒炒肉丝拌白米饭而成至交的情、因一碗皮蛋瘦肉粥而成挚友的记忆、以及一碗碗小馄饨汇聚而成的少年情,就会了无痕迹。

可见,无论是站在历史的纵贯线上总结豆子为人类进步所作的贡献,还是由法餐出发,回味一种美食为人们所推崇的经过,或者是脚踏实地地为每一单食一瓢饮唱颂歌,作者们都在试图引导读者打开一个观察世界的美妙角度,亦即美食的意义。三本看上去互不关联的书,因为“食物”这个关键词而并立。那么,我们在谈论食物的书里究竟读到了什么?我想,或许就是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人们,从远古至今,始终在为能前进一小步而努力着。

史海钩沉

他们何以流芳百世?

贾登荣

《在江湖与庙堂之间》一书以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秦观、陆游、杨万里、辛弃疾这11位两宋时期著名的文人士大夫为书写对象,以他们的落魄失意阶段为书写线索,通过对青史、年谱、作家作品、传记、行状、祭文、墓志铭、历代相关文章等的爬梳,再现了他们在贬谪、罢职、赋闲期间的心路历程和生活况味,从中发现他们共同的特质:在失意中展示傲然风骨,在磨难中铸造精神徽章,在落魄中实现涅槃重生,在逆境中尽显人生风骨。

虽然他们遭到贬谪,但他们心中那根做人的标尺始终没有移位。他们仍旧敢于直谏,维护道统,舍生取义,坚持真理;他们依然心忧天下,情系苍生,尽其所能,为民办事,从而流芳百世。如在《履霜操——范仲淹在睦州和饶州》中,作者写到,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第三次被贬往饶州任职。针对饶州民风顽劣好斗的特点,范仲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兴学校、移风俗。他选择一块林木掩映的地方,重建学校,扩大规模,让更多的学子能够读书。范仲淹在学校开学时说:“二十载后,当有魁天下者。”果然,治平二年(1065年),饶州学子彭汝砺状元及第,他的弟弟彭汝霖进士及第。范仲淹用后天的行动,实践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民生情怀。与范仲淹重视兴学一样,在《归归翩翩——杨万里最后十九年》中,我们看到,当杨万里被贬谪到筠州后,发现高安县没有县学,学子们只能寄居在州学的小斋房就读,于是马上动手兴建县学,让“一方学子咸集,学风大盛”;同时,他还“以德抚民,无为而治,境内刑清罚简,百姓安居乐业”;杨万里离开筠州后,这里的民众建起“三贤祠,纪念先后贬谪至此的余靖、苏轼以及杨万里。

两宋时期,官员贬谪之地,大都在偏僻荒凉之处,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生活条件相当艰苦,但作者通过查阅林林总总的史料发现,这些文人士大夫面对人生的重大考验,大都显得从容自信、乐观豁达,在贬谪中著书立说,在放逐中完善自我,将人生的至暗时刻转化为高光时刻。这样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如景祐三年(1036年),欧阳修受范仲淹牵连,被贬往峡州出任夷陵令。年届而立的他,对这次贬谪并不在意,反而认为是砥砺、升华自己的良机。在贬谪夷陵的三年间,欧阳修先后撰写了《易或问》《童子问》《诗解》《春秋论》《春秋或问》,还完成了记录五代十国的史书《十国志》《素履之往——逆境中的欧阳修》;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返回金陵老家,“致仕后的王安石,读书、写诗、钻研群经、深研佛家和道家著作、修订《字说》”(《江南多聚微——罢相后的王安石》);而黄庭坚在贬谪黔州期间,“书艺猛进,《廉颇蔺相如传》《砥柱铭》《李白秋浦歌十五首》等书法作品,为其奠定了宗师地位”(《风流犹拍——黄庭坚的逐客生涯》)……一个又一个文人士大夫,用他们的行动,践行着“君子坦荡荡”的人生格言。



《在江湖与庙堂之间——贬谪中的宋代文人》 傅勃松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三味书屋



《两种孤独》 [哥伦比亚]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著 侯健 译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1976年2月,马尔克斯与略萨在墨西哥一座电影院的电影首映式上重逢,马尔克斯主动跟老友打招呼,当他刚热情地喊出“马里奥”的时候,换来的却是对方的巴掌和拳头,略萨愤怒地说道:“你对帕特丽亚做了那种事,还有脸来见我?”自此以后,两人分道扬镳,再无交集,交恶事件也成了世界文坛的一桩公案,或者说一件充满八卦性质的“坊间美谈”。直至2007年,在《百年孤独》出版40周年之际,马尔克斯终于向略萨伸出了橄榄枝,请后者为这本书作序。略萨也欣然接受,对这部“美洲的《堂吉珂德》”给予盛赞。其实,略萨早在30年前就写好了这篇序言。

再回到故事的源头,马尔克斯与略萨早在1966年就开始通信,共同的文学爱好和理想志趣使得两人很快成为“虽未谋面,已然倾心”的同道密友。长期通信之后,他们才于1967年8月在加拉加

拉美文学最初的盛况与最后的同框

付 杰

斯机场进行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会面。一个月后的9月5日和9月7日,马尔克斯与略萨在秘鲁利马国立工程大学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文学长谈”。在这次交谈中,他们既回顾了成长经历和私人生活,也探讨了文学理念与政治议题。经过认真整理,这次谈话的录音文本形成了《两种孤独》一书,我们从中可以见证这两位文学大师异常珍稀的“唯一对话”,并一窥他们“甜蜜”而“完美”的友情时刻。

在这场没有设限却充满深刻洞见的对话中,年轻九岁的略萨担当发言者的角色,就“人生与文学、理论与实践、幻想与现实”等诸多问题与马尔克斯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讨。当时马尔克斯已经出版了五部小说,尤其是新出的《百年孤独》为其逐渐带来了世界性的巨大声誉;略萨则推出了《首领们》《城市与狗》和《绿房子》,还凭借《绿房子》获得了颇负盛名的罗慕洛·加拉格斯文学奖。他们是拉美“文学爆炸”的主要旗手,也是正在冉冉升起的文学巨星,两人的四手联弹犹如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学音乐会,激撞出了许多丰富有趣、发人深省的见解。略萨抛出的第一个问题十分形而上——“作家有什么用?”马尔克斯回答是十分坦诚:“我写作,是为了让朋友们更喜欢我。”继而他提出了文学/小说的破坏性功能,也即:“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我总发现某种将已被确立、被强行

赋予之事破坏掉的倾向,和助力创造新的生活和社会形式的倾向;总之,是改善人类的生活状态的倾向。”这一“作家何为”“文学何为”的见解,与卡内蒂和齐奥朗的观点暗暗契合,前者认为当代杰出的作家既总结时代,又对抗时代;后者更为直截了当——“对我来说,写作就是复仇。对世界的报复,对我自己的报复。我所写的一切,或多或少都是一场报复的产物。因此,它同时也带来解脱。”这种解脱,既包括精神的释放,也包括生理上的解压,就像马尔克斯在对谈中所说的:“现在我能确定的是写作是种迫切的志向,拥有这种志向的作家不得不写,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头痛和消化不良的问题。”

当然,除了被津津乐道的“拉美文学爆炸”,他们的对谈也延伸到了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他者视角与我者视角的分殊等,而涉及到写作态度和政治态度等问题时,仿佛像是预言式的谶语,更牵引出两人后来的政治立场——一个向左,一个向右,走向了完全相反的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首版曾名为《对话:拉丁美洲小说》,出版之后很快成为绝版,市场上只能看到盗版、授权存疑或者地下流通的版本。因此该书不仅在国内外内付之阙如,在拉美也是孤本一般的稀缺之物。至于书名为何改为“两种孤独”,在我看来,首先是着眼于两人的异质性,正如本书首版前言中所说:“巴尔加斯·略萨总是十分严格,擅长理论化的

东西,在争议面前表现得有条不紊,而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是带着自相矛盾的强烈幽默感,言语睿智而具有讽刺性,显得充满活力。”而在文学创作上,尽管他们都以文学为志业,并以“天选之人”的决心和意志向着伟大作家冲刺,但在作品风格上,马尔克斯为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略萨则是结构现实主义路线,且都以一部部出色的作品在各自领域内树立了一代宗师的地位。这种差异甚至还体现在了穿衣着装上,在这次对谈中,“巴尔加斯·略萨穿着完美无瑕的三件套,优雅得体,而加西亚·马尔克斯不仅没有打领带,还穿了件比亚和巴那纳托歌手常穿的花衬衫”。

当然,我认为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两人长达30余年的绝交,这使得曾彼此视为文学上的莫逆之友,不仅陷于“王不见王”的尴尬境地,更有一种“英雄惜英雄”的孤独之感。世界文坛上并不少见这种文豪决裂的“趣闻轶事”,如海明威与格特鲁德·斯泰因、纳博科夫与埃德蒙顿·威尔逊等。作家都是一群精神上高度自由的动物,能够与他们灵魂契合、彻夜长谈者本就寥寥无几,若失去了宝贵的精神同伴,想必在寂寥无人之时一定会感到无比的孤独。

在2017年7月的一次对谈中,当被问到“你在得知加西亚·马尔克斯去世的消息后有什么感觉”时,略萨答道:“当然感觉遗憾。和科塔萨尔或卡洛勒斯·富恩

特斯一样,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他们都是伟大的作家,此外还都曾是我的朋友,而且那时拉丁美洲正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身为作家,我们经历了拉丁美洲文学展现积极面貌的时期。”接着他又说道:“当我发现突然之间我变成那一代作家里唯一在世的人,变成最后一个能以第一人称谈论那段经历的人,我很难过。”世界文学的版图多以国别为单元,如英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日语文学等,而拉丁美洲文学则以大陆为尺度,这片土地上的作家具有一种高度凝聚的共同体意识,就像略萨所说:“比起秘鲁作家或哥伦比亚作家,我们更称得上是拉丁美洲作家,我们同属一个祖国。”因此,当略萨看到科塔萨尔、富恩特斯、马尔克斯相继去世时,除了遗憾和难过,一定还会感到难以抑制的寂寥和孤独吧。

《两种孤独》带领我们穿越到“文学爆炸”的激情年代,通过这两场对谈,我们重温了这场文学运动“最初的盛况”和两位文学大师“最后的同框”,领略了拉美文学广阔而美丽的风景与文学大师优雅而迷人的魅力。西蒙·阿隆说“对话的社会是人类的关键所在”,《两种孤独》是两位文学巨匠在流动的世界上展开的一场流动的对话,这场对话以自我与文学为噱头,以现实与政治为依归,指出了文学创作与作家责任的关键所在,既回应了宏大的命题,也定位了微小的个体。